



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

赵敏俐

摘要:先秦是历史上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伟大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个时代,但是现存的先秦文献大都是经过汉代人整理才得以流传的,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为此而对这些典籍的可靠性多有质疑。需要指出,汉代人尽最大可能地保存了劫后仅存的先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之虽然残缺但却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近年来大量先秦文献的出土发现,使我们对汉代人所做的这种文献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传承于汉代的这些先秦文献的可靠性和巨大价值必须充分肯定。汉代人接续肇自先秦时代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这正是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先秦;汉代;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学术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7)03-0092-15

先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每当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代,人们总要对先秦文化典籍进行研究与阐释,这正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返本开新”的意义所在。正因为如此,自清末以来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大变革中,学人也开始了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新一轮阐释。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学人不仅对先秦时代的文化思想多有批判,且对先秦典籍的真伪以及其传承过程亦进行了严格辨析。我们知道,现存传世的先秦文献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人整理才保留下来的。那么,这些先秦文献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原貌,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国自古就有优秀的文献传承制度和古籍保护传统,汉代人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自汉代传承下来的这些先秦文化典籍,直到明清时代,学人大多深信不疑。虽然自宋代以后逐渐开始有人对其中的部分文献产生怀疑,到清代疑古思潮兴起,对先秦文献的辨伪日渐增多,但基本上没有影响对这些先秦文献的整体信任。20世纪初以来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学

作者简介: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北京,100089。

本文系作者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驻访其间研究成果。



界对先秦典籍的辨伪达到高潮,对包括《周易》《尚书》《周礼》《左传》《老子》等在内的几乎每一部经典,都有人做过相应的考辨,指出其中的问题,提出新奇的观点。有的被指为汉代人所作,如《礼记》;有的被看成后人假托,如宋玉诸赋;有的甚至被判为伪书,如《列子》《文子》,等等。其积极意义,是使人们对于先秦典籍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其消极影响,是由此而生成的对先秦文献典籍过于大胆的多重解构。核心问题是,既然现在所看到的前秦文献大多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出来的,那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生形态?我们对它们应该如何认识?它们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建立有何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先秦文化又该进行怎样的研究?下面,笔者就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如何认识汉代人在传承先秦文献中的巨大贡献

在先秦经典向后世传承的过程中,汉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没有汉代人的整理和保存,大部分先秦文献典籍早就灰飞烟灭。面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残缺毁损,汉代人毅然承担起抢救和修复的重任。对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①可以说,目前可见的先秦经典,大都是经过汉代人的搜集整理校订之后流传下来的。根据班固记录,我们知道汉代人在搜集整理先秦文献典籍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从汉初开始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为了收集和抢救更多书籍,国家还专门派人到天下搜求遗书。第二,国家专门建设藏书之策,将收集来的书籍珍藏于皇家秘府保存,并设置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对每一部书的整理情况加以记录,上陈朝廷。第三,国家派专职人员对藏书进行分类整理与校对,建立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同时也初步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学术体系。

汉代人对先秦古籍的传承整理非常认真,这些整理工作的记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还有一些保存。如关于《易》类著作的整理:“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②关于《尚书》的整理:“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迄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4页。



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①刘向《管子书录》曰:“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重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②《晏子叙录》亦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笺,皆以定,以杀青,书可缮写。”^③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人对先秦经典的敬畏,他们尽可能地搜集全部同类图书,包括藏于国家秘府中的图书和私人藏书,将之进行细致校对,厘正文字,去其重复,重新编校,态度极其严肃。

在认真校对整理的基础上,汉代人对于先秦文献的流传及其作者做了尽可能的梳理和记录,对此,《汉书·艺文志》也有介绍。如关于《易经》的传承:“《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汉代人了解的《易》在先秦的早期传承,基本上采自于传世《易传》,认为是自宓戏首创八卦,文王演成六十四卦,由孔子作传,此即“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同时又介绍了《易》在汉代流传的经过,由田何到施、孟、梁丘、京氏诸家。所录易类著作共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尽可能地介绍了作者姓名、籍贯等内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服氏》二篇。《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韩氏》二篇。名婴。《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枢》五篇,图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⑤不仅如此,与之相对应,班固还在《儒林传》中对先秦到汉代有关《周易》的传承谱系做了简要介绍:“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②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③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4页。

⑤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3~1704页。

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矐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①接下来,班固又分别介绍了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诸人,以及未列入学官的费直与高相。从中可以看出,汉代人对于《周易》的传承,既有不同的文本系统,又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解说,叙述平实简洁,条目清晰,知之则录,不知则阙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史学传统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学术传统得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也是汉代人泽及后世的伟大功业。

二、如何认识汉代人在整理先秦文献过程中的诸多缺憾

(一) 汉传先秦文献存在的缺憾

汉传先秦典籍,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所造成的书籍散亡,给汉代人整理造成极大困难。对此,《汉书·艺文志》开篇就做了介绍:“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②因此,汉代人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对于先秦文献的传承过程,总的来说已经知之不详。如上文关于《易经》的整理与介绍,按汉代人所说,《易》因为是卜筮之书,秦火之后仍传承不绝,在汉初有田何,到宣、元之际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列于学官,民间尚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将这些不同版本与中秘所藏《古文易经》对校,发现它们大体一致,但是有个别文字不同,只有民间费氏的完全相同。看来,刘向校书时所看到的《易经》出于一个系统,应该是田何传下来的。但是这个系统最多只能追溯到汉初,至于《易经》在先秦的传承情况,虽然在《儒林传》中班固列出了《周易》之学自孔子之后的传承谱系,但是这些人物的具体生年事迹,以及如何传承等情况,班固并没有介绍,很可能东汉班固甚至西汉刘向等人对此已经不太清楚。近年来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就与传世本大不相同。这说明《周易》的传承远比班固《汉书》所记更为复杂,也许早在先秦,《周易》就存在着不同的文本。

关于《诗经》的记录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轅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③《诗》是另一部经过秦火而未毁的先秦经典,因为“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所以汉初就有三家诗在传授。班固将这几家《诗》做了比较,认为他们的解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后来发现的“毛公之学”,班固也做了介绍,但是对它的来源不敢确定,就用了“自谓子夏所传”的说法,态度非常谨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诗经》的本子,都是汉代传下来的。近年来发现了阜阳汉简《诗经》,与四家诗都不一样。可见,刘向等人还有一些没有看到的《诗经》传本。至于《诗经》在先秦的传承情况究竟如何,《艺文志》当中也没有记载。这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7~3598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说明,汉代人对于《诗经》在先秦的传授情况,可能所知也是极其有限的。

《汉书·艺文志》对于先秦文献传承的过程介绍不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它的主要目的只在于著录文献,第二是汉代人对于先秦时代的文献传承情况可能知道不多。《艺文志》将先秦和西汉的各类著述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著录书籍总数虽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是相关背景材料却很少。以“六艺略”为例,关于《易》《书》《诗》《礼》《乐》在先秦的传承情况,介绍都极其简略。^①稍详细一点的《春秋》和《左传》,也只是寥寥数语:“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②可知现在传世的《春秋》为孔子因鲁史而作,此说被后世认可。同时这段文字又说到了《左传》及其作者左丘明,认为他是和孔子同时之人,同观鲁之史记,他作《左传》的目的就是补充史实,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除此之外,我们便知之甚少。由此,关于《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等等,后人便多有争论。究其原因,还是汉代人记载过于简略的缘故。

相比较而言,《诸子略》的记载比《六艺略》稍微详细一些,不过大多数只是提到作者名字,个别著作有简要作者介绍,也仅限于时代、人名、职官与交游等,而且以上几项都全的记载也很少。如:“《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③和《六艺略》相比,《诸子略》的内容颇为驳杂。对于其中一些托名古人的著作,书中也做了必要的辨析。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有些没有留下作者名字和出于何时,也一一标明。如:“《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④由此可见,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对诸子学术渊源所做的介绍,与我们了解先秦学术传承情况的期望值相比还是太少。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除了孔子,后人知道的只是一些片断。像老子这样著名的哲学家,连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仍有争论。这说明,在汉代之前,没有人对先秦学术史做过梳理,也没有专门记载这些文献传承过程的著作。

① 《汉书》其他篇目也仅有零星记载,如《儒林传》中对《易》的传承关系的记载,但总的来说,汉人对于这些先秦文献的传承过程,所知已经不详。有些记载带有传闻性质,未必完全可靠,对此,后人已经做过很多考证与辨析。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事,《史记》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但是总的来说也是比较简略的。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4、1729、1735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9、1729、1731、1740、1725、1743页。

汉代人在秦火与战乱后所做的抢救性整理,不可能恢复先秦学术全景,仅得其大貌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不仅存在学术传承信息量上的严重不足,其文字文本也呈现比较混乱的状态。对此,汉代人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我们上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及刘向所言,《诗经》和《尚书》等先秦典籍在汉代都已经有了不同的传承学派,各学派之间所传承的经典就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使我们对于这些经典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被发现,其中关于《老子》一书就有甲、乙两种本子,它们与传世的《老子》有很大不同。紧接着1993年郭店简中发现的《老子》,既与《帛书》有异,也与传世本不同。对此,学人做了详细研究,如尹振环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帛本、简本与今本《老子》的异同问题。^①从时间上来看,郭店简本最早,为战国中晚期前后文字,马王堆帛书次之,是西汉早期文字。《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老子》则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还有刘向《说老子》四篇。以此而言,汉代的《老子》当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②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今传世的《老子》河上公注本,《汉书·艺文志》中却没有著录。《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萼公,毛萼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③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据此推测,河上丈人可能就是河上公,当生于战国时代,其传承体系比较清楚,以曹参在西汉初年的地位和老子学说的影响力,河上公之《老子注》应该在西汉时代有所流传,可是《汉书·艺文志》中却没有说明。由于其中所列的几个《老子》版本也已遗失,我们便不知道它们与《老子》河上公本有没有关系。现今传世的河上公注本,也不一定是西汉本的原样。同样复杂的还有《周易》。《周易》在西汉中期以后至少有六家在传承,“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此外西汉中秘尚有《古文易经》的传本,它们之间在经文文字上差异不大,可以肯定属于同一个传承体系。但是刘向、班固等人却没有看到马王堆帛书本,而这个本子与传世本《周易》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像《周易》《诗经》《老子》等一些重要的先秦文献,在汉代以前的传承过程中可能就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后人看到的由汉代人整理的传世文本,有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在整理过程中可能包括了汉代及其后人的增删,不复是先秦经典的原生形态。还有一些先秦经典,像《管子》《晏子春秋》,更是汉代人去其重复而重新整理的。至于《战国策》,甚至是由汉代人将先秦文献重新编辑而命名的。如刘向所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莠。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辅,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④由此可见,刘向编《战国策》时,是把中秘所藏的各种与之有关的文献去其重复和校对之后才编成的。但即便如此,他所看到的还远不是战国时代同类著作的全部。近年来马王堆所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篇,与《战国策》属于同类文字,但却与之大有不同,可见刘向并没有看到这些文字。

① 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

② 参见冯广宏:《〈老子〉传世版本三系说》,《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436页。

④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1页。

综上可知,先秦文献在汉代的传承情况是多么复杂。此外,在汉代人整理这些传世文献的时候,还存在着不同载体、不同时代的文字变异,不同学派、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别,还有通假、讹误、脱简、增损等各种现象。李学勤先生曾将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概括为以下十种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名亡实存。第三,为今本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改换文字。^①由此而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汉传先秦经典,不同程度地带上了汉代印记。之所以发现这些问题,得益于“五四”以来的科学精神和疑古学派对古代文化的批判意识。因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汉代人整理的先秦文献基本上是信任的,^②没有人对传世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做过细致的考证和辨析。而研判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审慎地利用这些传世文献从事学术研究,推动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学面对汉传先秦文献中存在的问题

后人在发现汉先秦文献存在的诸多问题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不顾及历史情境,对传世文献进行过度质疑。由此导致对这些传世文献的不信任乃至否定,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上文所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或多或少都有汉代整理者留下的印记,而且情况极其复杂,但是,无论这些经典文本在物质形态上存在着多少问题,并不能改变它们作为先秦文献的本质属性。那么,对于这些文献中存在的诸多疑问和缺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秉持历史的眼光,充分考虑汉代人整理和记录这些先秦文献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所能达到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不要做超越历史的苛责并因此将其否定。先秦时代中国还没有形成非常科学系统的学术体系和文献分类方法,我们迄今并不知晓先秦时代国家所藏文献的分类标准和文献著录情况,以及每一份文献的著录是否都标明作者、时代、卷数、版式、内容目录等项内容。从近年发现的先秦简帛文献来看,这些属于现代图书文献著录的基本信息,在那个时代的文献著录中存留很少,有的甚至连标题和作者都没有标明,更不要说在著述和抄写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现代学术规范了。秦统一中国之前,六国文字本身就有差异,自西周到春秋战国,又经过数百年变化,不同载体、不同学派在同类著述的抄写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不同。经过秦末战乱,面对大量的文献散失,汉代人能够将这些文献归类整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留下一份目录,已经难能可贵。当代学者可以根据汉代以后丰硕的研究成果,指出汉代人整理的这些先秦典籍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不断将其完善,使其更加接近先秦文献的原貌。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由对汉代人求全责备,更没有理由因为这些文献中所存在的诸多缺憾而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当代先秦学术研究中之所以对传世先秦文献存在过度质疑的倾向,与近代以来盛行的实证主义方法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科学而是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思考,这就决定了实证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有限性。尤其是证伪方法更要慎用,过度使用就会走向荒谬和虚无。遗憾的是,当下文史研究中恰恰实证主义大兴,一些人更是热衷于证伪。如果从纯粹的实证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传统文献里的大量记载是没有办法进行检验的,是可以随意质疑的。但

①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32页。

② 虽然自宋代以后,有人对汉代传承的这些典籍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发现,如郑樵等人,并且发出质疑的声音,清代崔述、姚际恒等人做出了更多的批判,但是作为中华传统学术的主流,古代学人对这些先秦经典的基本信任并没有动摇。

是,这些文献又是实实在在的先秦文化的文字存留,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们的历史存在。所以,治先秦学术的目的,应该是阐释传统而不是解构传统。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也不一样。某些外国学者热衷于运用考据学方法看待中国古典文献,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播方式了解不够,他们看到这些文献的记述方式与他们的知识谱系不合,便想由此来解构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建构符合西方学术理念的中国历史。中国学者如古史辨派热衷于运用考据学方法,是因为他们想用“事实”来证明古史仅为古史。而当下文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则表现为有学者深受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将本来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阐释,变成了碎片式考证,其结果会造成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解构。

三、如何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中认识传世先秦文献的宝贵价值

(一)不能以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

近百年来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竹简帛书等,为我们从事先秦学术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充分重视出土文献的价值,将其作为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可靠材料,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若由此否定传世文献的巨大价值,质疑其真实性,或者仅仅将它们作为汉代文献来看待,却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出土文献,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所产生的增损、讹误,没有融入后人的观念,因而更可信。那么,这些出土的先秦文献都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所写,今天要读懂它,是不是首先要用后人的文字学和文献学知识进行释读?能保证我们释读的这些出土文献就不会受到后人的质疑吗?即便是当下对这些出土文献的释读,也存在着大量争议,同样融入了当代人的观念。^①而且,如上博简和清华简,由于其出土地址、墓葬等诸多信息都不清楚,甚至有人怀疑其为当代人作伪。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比汉代人看到的更古老,如郭店简《老子》,因而就比汉代人所传的更为可靠。那么,何以证明郭店简《老子》就是《老子》的最初原本?何以证明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子》就不会是另一种同样来自先秦的文本?显然,虽然这些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具有珍贵的价值,但是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并不能轻下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的断言。即便是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也未必会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还以郭店简、马王堆帛书和传世本《老子》为例,经过比较,人们发现这些版本,包括汉代以后的一些本子,可以分成古本系、抄本系和行本系三个系统。它们的传承各有其不同的缘由,各有不同的优缺点,但同样都是渊源有自,从中得不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的结论。所以,认为我们所见的出土文献更为可靠而不相信汉代人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盲目的自信和对古人的偏见,不是历史主义态度。

① 以当下学界所关注的上博简和清华简为例,对于其中的重要篇目,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存在着不同的释读,不但其整理本带有当代人的学术印记,而且刚刚面世就有了不同的释读版本,究竟谁的释读才算正确?如《孔子诗论》为上博简发布时定的篇名,马承源认为其作者是孔子,这代表了整理者的意见。但是,上博简发布之后,裘锡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作者应该是子夏(“卜子”),李学勤表示赞同。此外还有人说可能是孔子的曾孙,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再如清华简中《周公之琴舞》发布后,马上也有了不同的释读版本,而且学界对这组竹简的文本释读、产生年代等都有相当大的分歧。



(二) 树立传世文献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

近百年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世文献。对此,当代学者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如傅道彬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例指出:“尽管《孔子诗论》丰富了我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认识,扩大了我们了解诗经学产生的理论视野,但是《孔子诗论》还是与《左传》《国语》《论语》等传世文献中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的。”这说明:“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是补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献的研究还是应当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①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发明,这是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学界的共识。光有这一共识还不够,我们还要认识到,治中国文化和先秦学术,不仅要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同样重视,更要以传世文献为研究和阐释出土文献的基础。

首先,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我们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当下很多人认为出土文献更有价值,但是出土文献的价值,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定的?难道不是依赖传世文献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吗?对此,裘锡圭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传世文献很重要,有些出土文献不根据传世文献几乎一点也读不通,过去很多人讲过了。譬如地下出土的尚有传本的古书,如果本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据今本来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王堆《周易》,用字很乱,假借字很多;还有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周易》,要是没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出来。这是说直接可以跟传世古书对读的(当然其间也有不少出入),还有很多不能直接对上的东西,怎么念通,还得靠有关的传世文献,还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②在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那些刻着文字的甲骨都被送到了中药铺,学人们之所以发现了它的价值,是因为认出了那上面的字。认字所依靠的是什么?是《说文》等传世文献给我们提供的古文字知识。在今天看来,《说文》里面有些文字的释读和偏旁的归类,存在许多问题,这说明许慎对古文字的构造和字义释读等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比许慎伟大,更不能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反过来,后人正是通过将甲骨和金石文字与《说文》的参照研究,才能认读这些出土文献,印证其价值。所以,治先秦学术,无论目前发现了多少出土文献,治学的基础还是传世文献,搞古文字研究的人还是首重《说文》。何以如此?因为许慎虽然没有生活在先秦,但是,他所生活的汉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这使得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先秦古文字,通晓从先秦古文字到汉代通行文字的变化。对此,他在《说文解字叙》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从传说的伏羲八卦、仓颉造书,到周代以六书为主的小学教育,一直讲到秦代的“书以八体”,王莽时代的“六书”的发展全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许慎才敢这样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③没有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古文字之学,我们今天就无法认读先秦出土文献。弄懂了《说文》,也就弄清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发展的来龙去脉,汉字的结体变化与构造原理。从汉到清,学者们在许慎的基础补充完善,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文字之学。当然,通过对这些甲骨、金石、简帛文字的研究,今人也进

① 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书城》2015年第9期。

③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3~764页。

一步发现许慎《说文》中的一些不足乃至错误之处,将中国的古文字之学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传统古文字之学的依赖,都建立在传统古文字之学的大厦之上。研究出土文献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说文解字》的作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次,治先秦学术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传世文献从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新发现,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它的可信度。以甲骨文研究为例,王国维之所以做出巨大贡献,就因为他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从而释读甲骨文中所刻写的殷商时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写出了名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将甲骨文的研究从文字释读提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门显学。王国维何以发现殷墟甲骨文里面有殷商先公先王的名字?是因为《史记》中有《殷本纪》一篇,记载了殷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和世系。从时代来讲,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间上距殷商王朝的灭亡已经接近千年,他怎么知道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字?他说自己看了很多前代的典籍,“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细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①虽然他看过的那些典籍今天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相信他的话。因为他生活在距离先秦最近的时代,曾经接触过先秦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客观事实。《史记》中所记载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参照而得到准确的印证,即便是他记载不详的一些史实,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考证而证明他所言不虚。甲骨文的发现,也证明了《史记》所记载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可靠。汉传先秦典籍,无论是“六艺”“诸子”,还是“诗赋”“数术”等,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献之所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也是经过千百年学术检验的结果。1926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②王国维对于传世文献记载所持的充分肯定态度尤其值得重视。他通过甲骨文与《史记》《山海经》《楚辞·天问》等的对比研究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怀疑古书。对于那些已经由其他文献证明其真实性的著作,固然不能再持怀疑态度;对于那些尚未得到证明的古书,也不要轻易否定。试想,古代历史上那么多文献都已经淹没无存,今天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所了解的古代文化知识也极其有限,怎么能以我们没见到、以超越了我们的知识限度为由而轻易地否定古人的记载呢?近几十年出土文献以生动的事例教育着我们。如郭店简《缁衣》篇的出土,证明《礼记》确为先秦文献的汇编;上博简证明了孔子对于《诗经》确有重要的论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篇的发现,证明了以往人们对于宋玉赋真伪问题的好多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尚书》的流传。今存传世本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宋代以来深受怀疑,伪书说几成铁案,但即便如此,此书中被视为属于今文《尚书》的28篇,后世学者仍然认为是传自先秦的文献。清华简《金縢》的发现,再一次显示这些文献的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3296、3319~3320页。

② 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卷4,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渊源有自。^①它使我们在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变迁之后,重新建立起对传世文献的信任与尊重。

再次,研究出土文献所以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依据这些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们已经建立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对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也一定要以这个知识谱系为基础。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墓到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引起轰动。何以如此?就因为这些出土文献,可以更为有效地补充中华文化传统知识谱系的空缺,使其更为完善、充实。而这些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以及受关注的程度,莫不与相关传世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紧密相连。如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文献中,学人最为关注的是帛书《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其中有佚传1700多年的《孙臆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同时面世,解决了孙武和孙臆是否一人的问题,也理清了这两部兵书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正好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儒家与道家思想在战国早期生成时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先秦思想发展史的线索。^②同样,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和诗类文献特别受人关注,也因为它们与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传世经典《诗经》与《尚书》紧密相关。当然,这几批重要的出土文献还包括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连汉代人也没有见到过的文字,它们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方术和地图类文献,上博简中的《子羔》《容成氏》等文献,清华简中的《楚居》和伊尹相关文献(《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它们的重要价值,同样也是在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发明中才得以体现的。因此,不熟悉传世文献,对于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知识谱系没有很好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的宝贵价值,是出土文献不可能超越的。

四、如何认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传统

(一)传世文献经典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是连汉代人也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些文献大大补充了先秦传世文献的不足,使我们对先秦学术的实际状况有更多的了解,修正、充实了现有的学术体系,甚至从某些方面修改了传统的学术史。那这些重要的文献,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些经过汉代人整理遗留下来的文献,是出于一种偶然,还是经过历史考验和文化淘汰之后的必然结果呢?假如汉代人整理流传下来的文献不是现在传世的那些文献,而恰好是近年来出土的这些文

① 在学者们所认定的《今文尚书》28篇中,《金縢》一篇问题最多,因为其中所记载的故事颇有传奇色彩,所以自宋以来颇被怀疑为伪造。但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的发现,则否定了这一怀疑,证明《金縢》确为先秦之文。而且,将传世本与简本比较,发现简本是一个删减本,传世本文意更为完足(参见黄怀信:《清华简〈金縢〉校读》,《古籍研究整理学刊》2011年第3期)。姚苏杰经过考证之后认为简本《金縢》虽可纠正传世本文字多处讹误,但其本身亦未必是当时善本,故不能据简本而断定传世本所多之文字为伪(参见姚苏杰:《论〈尚书·金縢〉中的“穆卜”》,《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可视为儒道共同典籍一篇,为《五行》;儒家典籍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这些典籍中《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其余则为早已佚失的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

献,一部中华学术史是不是就变成另外一副样子?这种看法表面上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有真正的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分析《史记》《汉书》等著作会发现,汉代人在搜集、抢救、整理这些先秦典籍的时候首推“六艺”。汉初著名的经学家有些人在秦朝时就是博士,如《今文尚书》的传授者伏生;其他人也都是出生于先秦的学者,如《易经》的传授者田何,《诗经》的传授者鲁人申培,《礼经》的传授者高堂生,《春秋左传》的传授者张苍诸人。这说明,汉代的经学传授都是源自先秦的。“六经”之说在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从现存文献看,“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以迹哉!’”^①此段对话带有后人创作的味道,但“六经”之名的出现,则说明它已经被战国的知识阶层所认可。《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③虽然没有提“六经”之名,但这六部书却赫然在列,且此篇名曰“经解”,说明其已有“经”之名分。《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④这说明,以“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是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事实。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承刘歆《七略》和刘向《别录》,首列“六艺”之学,正因为其重要,所以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尽管经过了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禁书令的颁布和秦末的战乱,还是有一批学者在坚守着文化传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⑤“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⑥所以到汉初,《易》主要传自田何,《书》主要传自伏生,《诗》主要传自齐鲁韩毛四家,《礼》主要传自高堂生,治《公羊春秋》有胡毋生和董仲舒,治《穀梁春秋》有瑕丘江公,治《春秋左氏传》则有张苍、贾谊,^⑦经学的传授一直没有断绝。由此可见,“六经”传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在先秦就已经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任何民族中的文化经典,究其实质都源于其自身价值的巨大,而绝不是后人强行推崇的结果,越是传承久远的经典,越具有这样的特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⑧《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所以在战国时代被视为经典,皆因为当时人已经认识到其价值。

“六经”之经典地位的确定,在先秦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反映了自春秋末期到战国后期的学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汉书·艺文志》开篇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

①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531~532页。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③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03页。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

⑤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2页。

⑥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3页。

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从文献学角度看,《艺文志》的记载印证了这段话。周代以来的先秦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孔子之前,可称之为“六经初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孔子之后,可称之为“六经确立”阶段。史传“六经”都经过孔子整理,《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是说《尚书》为孔子所编成,《礼》的成书也与他有重要关系。又曰:“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说乐经也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又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知《诗经》可能经过孔子重编,《易传》则为孔子所做。又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①在司马迁看来,“六经”形成和传承都与孔子有关。对此,当代学者已经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对于汉代人的这些说法有补充、有修正、也有质疑。^②但是从总体上看,说孔子和“六经”之间有密切关系,说他在“六经”的传播和整理过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没有问题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孔子开始,“六经”才真正成为儒家以及诸子百家传习和研究的学问,到了战国才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六经”在孔子之前的传承情况记载不明,这从文献学的角度也证明了孔子在“六经”传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③孔子及其弟子和后学对“六经”的传承、整理、研究和阐释,对“六经”最终确立权威地位至关重要。如《周易》有“十翼”的相辅,才从周代的占卜之书提升为一部具有深厚哲学底蕴的中华经典;《尚书》将三代的历史文献经过重新的编排,才成为具有昭示中华民族圣贤政治和大同理想的治国典范式著作;《诗经》经过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才被提升到“思无邪”的高度,更充分地发挥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礼》的各种社会政治世俗仪式,经过“记”的发挥与解说,才被赋予更多的政治道德伦理意义;《春秋》经过“三传”的解说,其微言大义才得以更好的彰显。最为典型的

① 以上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36、1936、1936~1937、1943页。

②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近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司马迁、班固等汉人所记,衡之于传世文献,会发现里面还有好多疑问,如《诗经》是否由孔子所编,关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经过今人的考证,就不准确。因为早在孔子出世之前,《诗》之名已经存在,而且其基本篇目也已大致确定。这说明,汉人所记载的有关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既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可能又存在着后世口耳相传的讹误。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否定孔子在《诗经》传承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论语》中多处论《诗》,上博简中新发现《孔子诗论》,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孔子与《诗经》的关系甚为紧密。

③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8页。

是《易》与《春秋》，它们都因为有“传”的辅助而价值大增，《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①这里面自然也留下了战国甚至汉代人的思想痕迹。但是，这些号称为“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与“经”相辅而行，是因为它们深得“经”的精髓，其中有些篇目本身的论述也达到了文化经典的高度，如《左传》，如《易·系辞》，如《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等。这些著作在汉代以后得到传承且被发扬光大，自然不是偶然现象。

先秦时代“六经”的地位已经确立，经学的阐释传统也初具模型，这是中华学术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相比较而言，战国虽然是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但是对于诸子百家之学的系统分析和总结，却不及汉代。百家之学到底有多少家？按《汉书·艺文志》所记，包括西汉在内，有“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阴阳二十一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从横十二家”“杂二十家”“农九家”“小说十五家”，总计“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这百八十九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为汉代人的著作，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不知作者时代或者明显假托古人，班固都予以注明。从各家所存留著作的数量来看，儒道两家所占比重最大，这颇能显示从战国到西汉时代诸子百家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文志》所辑录的诸子百家著作当中，最被后人重视的当属管、晏、老、庄、孟、荀、孙子、商君及吕氏诸家。与之相一致的是，在《史记》中司马迁分别给他们做了传记。这说明，在汉代人眼里，这些人物在诸子百家当中出类拔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些著作所以在汉代以后被很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非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汉书·艺文志》六略的顺序按文献价值的重要性排列，反映了这些著作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个由大到小、由显到隐、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顺序。排在“六艺”“诸子”之后的依次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艺文志》所提供的著录信息，也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向，以作者为例，介绍最详细的是“诸子略”，最简略的是“数术略”和“方技略”。这说明，先秦文献典籍的不同地位，基本反映了从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以“六经”为核心的中华学术传统发展的实际状况。

（二）出土文献的经典价值不宜被过分夸大

反观近百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最重要且数量最大者是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其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相对于简帛更易于保存久远，其中甲骨文属于与殷周王室生活相关的占卜记录，在当时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但是与我们常说的经史子集类的图书文献是有区别的。打个比方，它们属于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而不属于图书馆的图书文献。青铜器主要作为殷周时代的日常生活器物和宗教祭祀礼器，上面的文字则是与持有者生活相关的记录，是作为青铜器的要素之一而与之并存的，同样也不属于《汉志》所说的“书简”“篇籍”范畴。它们无疑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文化思想的重要材料，甚至会成为我们今天治先秦学术的重要领域。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在先秦时代还不可能直接纳入以“六经”为主的学术体系，也不可能作为建构诸子之学的直接材料。此外，在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数术方技类文献。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它们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是不如“六经”和“诸子”重要。因为代表一个民族主流思想传统的文献，一定是先贤们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一定是超越实践层面的形而上学之道。而作为中华文化传

① 《左传》是否为解释《春秋》的著作，至今仍然有争论。但是从书名以及书写体例来看，说它与《春秋》有紧密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一说法可能有据，我们并不能轻易否定之。



统主流的理论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六经”和“诸子”之学当中,其次才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可以确信,汉代人先秦文献的价值判断是有标准的,所抢救整理的先秦文献也是有选择的。据《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抢先就把秦王朝的图书收藏起来:“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以此可知,汉代传承下来的先秦各类实用性的文书材料,包括各类公文、档案户籍、财计账簿、简牍书信等会有很多,而且未必受秦人焚书的影响。但是,它们不属于汉代人眼中的“书简”“篇籍”,也不会纳入抢救和编入《艺文志》的范畴。因此,认为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中华文献经典在汉代之所以得到保存是出于偶然,不符合从先秦到汉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讲,近几十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所以被埋于墓葬,可能只是出于墓主生前的喜好,或者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埋葬者也未必将它们看成可以流传百世的经典。它们能够在古墓中保存下来以至于被今人发现,倒是具有多方面的偶然性。

五、结语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先秦文献的传承形态及其价值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旨在说明,经汉代人整理而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他们尽最大可能保存了先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其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之虽然残缺但却基本真实反映了先秦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汉代人在这方面不仅有抢救之功,而且在此基础上接续肇自先秦时代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如果说以前我们对此还认识不够的话,那么通过近年来对出土先秦文献的研究,我们对汉代人所做的这种文献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经过汉代人的搜集与整理,以“六艺”和“诸子”为代表的最为重要的先秦文献典籍最大可能地得以保存。近几十年来虽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先秦文献,但是总的来说,其重要性尚不足以取代传世文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对汉代人所做的整理工作有了更多的信任,证明他们的记载基本可靠,不能以其中存在着某些疑问而轻易否定。出土文献的大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新材料,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传世文献的价值。

责任编辑:李彦姝